

岳家军：乌合之众炼成威武之师(1)

◆ 郭晔昊

起源：国难中诞生的“岳家军”

说起“岳家军”，不能不提《满江红》里的那句今人耳熟能详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靖康二年(1127年)闰十一月的“靖康之变”导致了北宋政权的灭亡，也让宋太祖赵匡胤苦心孤诣建立的那套军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本人的军制土崩瓦解。原先由朝廷直接掌握全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禁军)，“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随着数十万禁军在金军二次南侵的战争中非亡即溃，基本消失殆尽而不复存在。经历了东京(开封)失守、徽钦“北狩”的国难之后，赵构在江南重建的宋政权，虽然名义上叫做“中兴”，实际却跟“草创”无甚差别：金人铁骑的南下追击迫使这位康王“泥马渡江”，甚至一度落到流亡海上的地步；宋廷中央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正规军队，抵抗女真人的重担在很大程度上需依靠那些靠扩张私人军队并吸收流寇渐成规模的将军们”。

挨到建炎三年(1129年)，南宋统治机构总算初具规模，终于将分驻抗金前线各军事要地的野战主力部队统一番号为“御前五军”，第二年改为“神武五军”；到了绍兴五年(1135年)，因“神武”乃是当年北齐军号，又改成了“行营护军”。尽管名义上已经被中央收编，但时人依然习惯以大将的名号称呼所部军队，譬如张俊的军队叫“张家军”，韩世忠的手下，则曰“韩家军”，兵将间的私人隶属味道很浓。这在北宋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谋逆行为，就连杨司令公如此威名盖世，却也是个可怜的光杆司令，手里连一支骨干部队都没有，只是在征战之际，才有份指挥来自各支不相统属的禁军临时拼凑的部队。

南宋初年的统兵将领，不光长期手握重兵，权力也更大，辖区以内可以先斩后奏，便宜行事；上马管兵，下马管民，军权财权都尽在掌握，基本上就是辖区内的土皇帝。这在满脑



■ 电视剧《精忠岳飞》剧照

子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文官集团看来简直就是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重演，有人(不是秦桧)就向宋高宗上书进言，各路大军只知道有自己的统帅，人人都是各为其主，还有谁晓得有皇帝陛下呢？这些文官只记得北宋初年收藩镇之权是让“天下无事百有五十年”的良法，却没有看到这“百有五十年”间宋军外战的不振，更忘记了靖康之耻实际上就是北宋兵制“四方守事力单寡，束手而莫知所出”这一弊端的大暴露，而其结果就是整个北中国的沦陷！在金人强兵压境的局面下，南宋当局向统兵将领放权也算是与时俱进的举措，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守将拥有更多权力，增加其守土御敌的责任感，最大限度地调动辖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抵御金军——毕竟能打胜仗才是硬道理，“政治正确”只能暂时摆到一边。于是，北宋只能有“杨家将”，而南宋却出现了“岳家军”。

岳家军的起源，还要追溯到建炎年间的东京留守司部队。金军灭亡北宋后暂时北归，一向主张抗金的宗泽出任东京留守，收编了大量溃兵和义军，并且积极联系河北的抗金武装，一时间军威很盛，号称百万。投军的岳

飞在宗泽麾下，从基层做起，凭借军功一步步晋升至将领。然而在宗泽 1128 年三呼“过河”而去世之后，继任者杜充御下无能，义兵闻风解体。几天之内人心就散了，将士去者十五，两河豪杰皆不为用，以致时人有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换成杜充就变成“兵皆为盗”之叹。后来杜充退至江南时尚且拥兵十万，面对金军南下时却轻易投降，致使这支昔日威震中原的东京留守司部队彻底瓦解。只有岳飞的队伍成为仅存的硕果，在大军溃散之余，时任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的岳飞率部移屯宜兴，相继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从此独自成军，揭开了“岳家军”的传奇篇章。

军纪：南宋第一强兵

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前，以长江边的鄂州(今属湖北，治所在现武汉市武昌区)为基地，岳家军(正式名称是“行营后护军”)已壮大到 10 万之众。当时，在南宋初年名震一方的宋廷大将领中，淮西张俊所部 8 万人；淮东韩世忠所部仅有 3 万人；远在四川的吴玠手下也只有 6.8 万人。岳家军已然成为南宋朝廷各支大军规模之首。

在岳家军的十多万大军之中，真正从东京留守司时代延续下来的老班底只有大约两千人，而南宋当局历来拨给岳飞的部队为数也不很多。岳家军的兵员主体，是岳飞在绍兴元年(1131年)到绍兴五年间，率部驰骋在湖湘等地，平定不服朝廷的盗贼土寇后收编的壮丁。

受战乱影响，溃兵盗贼当时遍布大江南北。这帮人的来源大致是两个：一部分是由北方民间的抗金武装和各地勤王义军转化而来；另一部分是由被金人击溃而逃散的士兵转化而来。对于这些令人头痛的溃兵盗贼，大敌当前的宋廷通常息事宁人，以招抚收编为主，以致当时出现了“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

奇谋只是招”、“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临时首都)卖酒醋”之类的俚语。但溃兵盗贼中总有强梁反复者，敬酒不吃吃罚酒，被岳飞奉命剿灭。但岳飞在平乱之后对大批被俘者的宽大处置令人赞叹，除元凶外皆不问(甚至在江西拒绝过宋高宗的屠城密令)，老弱者放归田里，精壮者则被收编入伍，成为“岳家军”的一员。绍兴二年(1132)二月，岳飞剿灭并收编盗匪曹成部后，兵力即暴增一倍，达两万四千人，已与其他几位大将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的兵力并驾齐驱。三年以后，岳飞又奉命进剿了盘踞在洞庭湖地区的“湖贼”杨么，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消除了这一朝廷的心腹之患。得胜之后，有部将建议岳飞在鼎州(今常德)大开杀戒以显示军威，并让当地人“知所怕惧”，被岳飞严词拒绝。免遭一场荼毒的当地百姓从此对岳飞怀有很深的好感，直到几十年后的宋孝宗淳熙年间，常德一带的老百姓依旧对“岳枢相”感恩戴德；而原先杨么手下的丁壮被编入岳家军的大约有五六万人，远超过岳家军在剿灭杨么前的兵员数量。

如果只是兵员多达十万，这样的军队其实也不足恃。北宋时代禁军最多超过 100 万(可见林冲的 80 万禁军教头货真价实)，却是军纪松散连战皆溃，辽、金、西夏个个都成了苦主，足见一支军队如果只是人数多，也不过是乌合之众，更何况岳家军中从溃兵盗贼中收编而来的大多数兵员，本来就是些目无法纪、纪律散漫的亡命之徒！

但是，就是以这些原先货真价实的乌合之众为主组成的岳家军，在史籍上却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著称，这一点不仅在当时，甚至在整个古代中国，都堪称卓尔不群。昨日当流贼时烧杀奸掠，无恶不作，今日在岳家军里却是俯首贴耳，令行禁止。如此奇迹般变化的背后，是岳飞的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如同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所言，岳家军的军纪为“中兴第一”！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

10. 化装成绸布店老板

1940年3月25日，新四军3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受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委派，离开皖南千里跋涉奔赴常熟，负责组织苏南东路地区军政委员会，主持领导东路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

到东路走马上任前，38岁的谭震林第一次当了爸爸，妻子葛慧敏与新生的女儿留在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受命到东路开辟抗日根据地新局面后，谭震林抓紧了解东路情况，向“江抗”驻地行进途中反复与同行干部研究酝酿发展东路局面方针，到达溧阳县水西村后，又听取陈毅、粟裕意见。他打算到东路后，首先抓两件事。一是培养 200 名连级军政干部，组建 50 个连队；二是大力发展部队，尽快搞起 10000 人枪的抗日武装。凭借这支力量，独立自主开展平原水网地区抗日游击战，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

化装成绸布店老板的谭震林，带着张开荆、刘飞、戴克林、樊道余、白书章、张麇等人，各自着新购置的长袍礼帽和皮鞋，由供给部副部长吴师孟陪同翻过大茅山，在延陵附近找到茅山中心县委办好“良民证”，在“老牛”张志强接应下乘船到常州西门外梓昌豆行地下交通站。谭震林等 8 人分成两组，分头乘火车到达苏州，住在阊门外的东来旅馆。

那天，一副阔商派头的谭震林、刘飞、戴克林一行正在街上走着，戴克林的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回头看去，只见一个扮相妖冶的年轻女子，正站在路边搔首弄姿，望着他哧哧地笑。戴克林知道遇到了妓女，慌忙摆摆手，情急之下竟脱口说道：“同志，这不行呀……”话未说完，就感到语中有失。谭震林瞪了戴克林一眼，带着几个人迅速摆脱了妓女的纠缠，走远后对同行的几个人说：“大庭广众之下，决不能随便叫同志，那不等于告诉别人你的身份了吗？”大家连连点头，深感从根据地到敌占区，还真有些不适应。因苏州日军每晚 10 点查房，谭震林一行便早早吃了晚饭躲进



电影院，连看两三场电影，午夜查房后再回住处。

从苏州到常熟的船上，有两个商人打扮的人热情跟谭震林一行聊天，一路上请他们吸烟、代付茶钱，还买来小笼包子让谭震林等人吃，弄得大家心里七上八下。谭震林给同行的刘飞等人使眼色，提醒大家提高警惕。船到徐市，两个商人模样的人得意地说：“从苏州一上船，就知道你们是到我‘江抗’来的。你们一人一个口音，没有女人，老实正派，当然是新四军啦！”一声“我‘江抗’”，使大家轻松笑了起来。

4月24日，谭震林一到常熟，不顾舟车劳顿的疲乏，迅即在徐市附近的江家宅基村召开江南特委、常熟和苏州县委、新“江抗”东路司令部、常熟“民抗”主要负责人会议。会议一连开了 3 天，史称“徐市会议”。会议宣布成立以谭震林为书记，何克希、温玉成、张开荆、吴达人、任天石、王承业等人为委员的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全面领导东路的党、政、军工作。同时，将原江南抗日义勇军改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化名林俊，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任副司令员，张开荆任参谋长，吴仲超任政治部副主任。会上，对“江抗”原有部队和常熟抗日武装进行了整编。将常熟“民抗”的 3 个连和原“江抗”东路司令部指挥的 4 个连统一整编为 2 个支队。与此同时，赴沪治疗 4 个月随谭震林重返东路的刘飞，被任命为江南抗日救国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刘飞随谭震林化装通过敌占区到达常熟后，充分发挥熟悉环境和人头的优势努力工作，很快成为谭震林的得力助手。

1940年11月6日，“江抗”东路指挥部召开新“江抗”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谭震林宣布，在指挥部与支队之间增设纵队一级。“江抗”整编为相当于团的 3 个纵队，1、5 支队为第 1 纵队，司令员夏光，政治委员刘飞；2、6 支队为第 2 纵队，司令员陈挺，政治处主任张麇；3、4 支队为第 3 纵队，司令员朱朱清，政治委员温玉成；教导队也扩大为有 3 个中队的教导大队。夏光和刘飞两位阳澄湖后方医院伤病员的前后任领导人，又亲密无间并肩在一起战斗。

22. 西学先驱徐光启

明清之际，上海地区涌现出许多世家望族，他们大多出身于科举仕途，地位崇高，并对上海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

徐光启(1562-1633年)，在他出生之前，上海沿海一带经常遭受倭寇骚扰，幼年的徐光启，听父辈们讲述上海人民反抗倭寇侵略的事迹，深受感动，爱国爱乡的热情油然而生。他苦学不辍，1604年考中进士，那一年他已经 43 岁，被朝廷选为翰林院学士。此后数年，他得以与相交甚厚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频繁往来，利玛窦除了向徐光启传经讲道外，还展示和介绍了许多西方科学的成就和成果。徐光启认为学习西方的科学，对国家富强有好处，就决心拜利玛窦为师，向他学习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等各方面的科学知识。

有一次，利玛窦跟他谈起，西方有一本数学著作叫《几何原本》，是古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一本重要著作，可惜很不容易用汉文把它翻译过来。徐光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翻译成汉文。

自那以后，他每天下午一离开翰林院，就跟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翻译记录。那时候，还没有人译过国外数学著作，要把原著准确地翻译成汉文，确实难度很大。徐光启呕心沥血，逐字逐句，反复推敲、修改，常常是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终于把前六卷《几何原本》翻译完成。

他还跟利玛窦及另一传教士熊三拔合作，翻译过测量、水利方面的科学著作《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1607年，《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刊印。同年，徐光启父亲去世，按照明朝的法律，他必须回乡守制三年，回到上海守丧，适逢江南洪灾，庄稼被淹。水退以后，农田颗粒无收。他就帮助民众从闽地引来一批甘薯秧苗，在荒地上带头试种，过了不久，长得一片葱绿和茂盛。后来，他特地编了一本书，推广种甘薯的办法。本来只在闽地沿海种植的甘薯就被移植到江浙一带来了。在徐光启守制最后一年，利玛窦在北京

去世，两人的合作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最打动徐光启的是西欧科学知识。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科学思维”，徐光启最了不起之处，是他能够正视中国科学的弱点。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具有自信，并不认为学习西方的长处，就会毁灭自己的文化。1600年的中国，徐光启是少数几个了解世界局势大格局的士大夫

之一。愿意正视西方文化，敢于接受思想挑战，他是当时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除了翻译工作，徐光启还身体力行，进行科学研究，积极应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最能代表他的科学成就是《崇祯历书》和《农政全书》两部著作。《崇祯历书》是一部革命性的历法，受命督修历法的徐光启，大力引进西方天文学和数学知识，广泛地使用西式天文仪器。书中甚至详细介绍了当时欧洲天文学家伽利略的方法，并第一次使用望远镜观察天象。《农政全书》共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等 12 篇，共 60 卷，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农政全书》堪称中国历史上体系最为庞大的农业百科全书，是一部空前的集大成之作，惠及了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

明神宗死后，神宗的孙子朱由校即位，即明熹宗。明熹宗执政后，又召徐光启进京。徐光启复官后，见后金对明朝的威胁越来越大，又竭力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兵部尚书却极力反对，为此，他们之间争执不休，矛盾很大，结果徐光启被排挤出朝廷。徐光启辞官回乡时，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1633年与世长辞，归葬原籍，选择“肇嘉浜北原”作为墓址，这里通黄浦江的肇嘉浜、通吴淞江的法华泾，在漕河泾附近交汇，徐光启墓地就坐落于这三条河流的交汇处，人称“徐家汇”。后来，徐光启的子孙也在这里生息繁衍。

徐光启是个科学天才，人称徐光启终其一生，未能看到他的政治理想和科技理想的实现。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复苏机会，到底没有被当朝主政者抓住。

醉上海

仲富兰

